

其周边道路金沙江路、大渡河路等，出自毛泽东同志《七律·长征》。海南也有长征镇。当然，如今甘肃省白银市地名中的长征、红会、近会等地，确实曾经留下过红军西征的足迹。1936年秋，红一、红四方面军曾在现属于白银市的历史重镇打拉池会师。1958年始建的包兰铁路红会支线上，设有红会、近会、长征等车站，名称都与红军长征有关。

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长征火箭，从1970年首发“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始，至今已出现退役、现役共计4代20余种型号长征火箭，为中国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等做出并将继续做出卓越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进行新的长征而奋斗”，第一次将长征精神引入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图景。此后，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新长征”逐渐被赋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展导向。长征胜利50年时，中央提出“弘扬长征精神的核心目的在于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长征精神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现实意涵与使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对此，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虹认为：“‘新时代的长征’之语境中，长征精神不仅成为历史的回望，更转化为推进治理现代化和实现国家战略的精神支撑。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新时代长征精神具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质。其在延续革命理想主义基调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制度自信、人民立场与技术赋能，形成与国家发展相适应的精神体系。从‘革命动员’到‘发展治理’，其核心功能实现了由政治动员



9月10日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向治理引领的转型。”

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兼文化领导力专委会主任陈麟辉研究员则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当年红军长征胜利以后，国统区许多青年投奔延安。而在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内迁的工商界、学生等等，也有人选择了延安。在上海与人合办利用五金厂的沈鸿于1937年8月25日晚租用民船，将人员机器撤往武汉继续办厂。当武汉也将沦陷之际，国民政府要求工厂继续内迁，可沈鸿遭遇租船困难，对国民政府大失所望。也正在此时，他听了从延安采访回到武汉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演讲，对红军长征到延安，并艰苦抗日在行动有了了解，于是寻到汉口寻到八路军办事处，最终想方设法、几经辗转投奔了延安。“沈鸿填补了边区工业的空白。1942年，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无限忠诚’的奖状。”陈麟辉说，“为了革命需要，沈鸿直到1947年才入党。新中国成立后，在这幅员辽阔的农业国工业化的进程中，

沈鸿专注创新之事，1957年至1958年间，沈鸿在担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期间，主动向毛主席请缨兼任12000吨水压机总设计师。直到改革开放之际，在担任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时，沈鸿又对引入外国技术的宝钢非常关心。”陈麟辉称，沈鸿投奔革命并长期投入工业创新工作，实质上也是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时期的种种体现。

朱虹认为，长征精神自形成以来，历经原生建构、功能拓展与体系嵌入，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之中。新时代条件下，其精神特质不断融合制度优势与技术创新逻辑，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精神支撑。■